

(197)

九一八事變前後 蔣總統的對日政策

李雲漢

總統 蔣中正先生，勳業彪炳，功在黨國。綜其一生之奮鬥，實與近世中華民國的命運相終始。中華民國開國於辛亥革命告成之日，蔣先生於辛亥革命却爲光復浙江杭州的首功，是亦爲參與創立民國之一人。其後以袁世凱爲渠魁之北洋軍閥竊權禍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乃督率黨人，繼續爲維護中華民國法統而奮鬥，歷討袁、護法諸役，蔣先生幾無役不與，國父且倚之爲左右手。及國父於民國十四年逝世，蔣先生繼承革命大業，於此後二十年（一九二五—一九四五）內，在民國歷史上創建了五大成就：（一）完成北伐實現統一；（二）清剿共黨消弭匪患；（三）領導抗戰收復失土；（四）廢除不平等條約，打破中華民族一百年來之枷鎖；（五）推進國家建設，實施民主憲政，爲國家現代化奠定穩固的基礎。推功論能，蔣先生實爲民國史上的第一人，五十年來的中國命運係由他一手掌握。

蔣先生爲國家民族所作持久奮鬥的過程，雖已史帙浩繁，其輝煌史蹟，國人亦類能明悉；然亦有若干重要歷史關鍵，蔣先生之卓識遠見却一時未能爲國人所明察者，如九一八事變前後蔣先生應付日本侵略的明智策略，即其例也。本文主旨即在依據歷史文獻與事實，析述蔣先生爲應付此一危急關頭所採明智政策的背景與成效，藉使讀者能於歷史的軌跡中更能體認蔣先生的人格與識見，亦更能有助於對有關人物是非功過的評價。

一、洞悉日本侵略陰謀

在近代中國的軍政領袖人物中，毫無疑問的，蔣先生是對日本瞭解最爲深刻的一位。這一方面是由於蔣先生早年留日學習軍事（一九〇八—一九一一），民國開國後又曾兩度赴日居留共達三年之久，（註一）對日本的立國精神與建國過程，都曾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一方面是由於蔣先生在參與及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特別是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九二六）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有數度直接與日本當局接觸的經驗，也曾不止一次的派遣專使到日本去作縝密的考察，這都使蔣先生對日本的國力與軍國主義興起後的侵略趨勢，瞭如指掌。蔣先生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對日政策的釐訂，由於他對日本的認識較其他領導人士爲深刻而正確，因而常能把握時勢，立於主動，針對日本的陰謀，採取最能符合我國家民族永久利益的因應措施。

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於底定長江中游即將進行以佔領寧、滬爲目標的東南作戰之際，即面臨如何應付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干涉的問題。尤其是日本當時的態度，對北伐成敗的影響甚大。經蔣先生的提議，中央政治會議乃決議派戴季陶爲

(198)

代表赴日訪問，藉向日本朝野說明國民革命的目的，觀察日本政局的動向，盼能說服日本當局放棄對中國統一運動的干涉，與國民政府在平等的基礎上，謀兩國關係的改善。

戴季陶這次赴日訪問，只有其夫人鈕有恆一人隨行。戴氏夫婦係於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自上海啓程，十七日抵達門司。歷訪神戶、東京、大阪、長崎等地，於三月三十一日回抵上海，歷時一月又半。除發表八十餘次講演外，戴氏曾與日本朝野作多方面的接觸。戴氏發現：日本政界人士如西園寺、澁澤子、佐分利等人，雖對中國情勢略有瞭解，軍部人員及黑龍會份子，却公然對戴顯露其侵華的野心。據戴氏自述，在陸相官邸的一次宴會中，日本陸軍省大臣曾以傲慢的態度當面向他挑釁：

「敬賀戴先生，革命黨已得南京。昔年君等僅據有廣東此一隅之地，不足以言天下，南京則是國際舞台。一國之建立，需要實力，非恃空論。日本之有今日，乃武力爭戰勝利而來。諸君如何？請幹吧！」（註二）

在另一次黑龍會的宴會中，戴亦發現「席間惟見一片殺伐之氣。」（註三）戴綜合這次訪日所得的印象是「戰禍已不可避免」，因此他於回國向 蔣先生復命時，即詳述中日關係的危機，主張「惟有努力於全國一致以自立自救者，求世界之和平。」（註四）

戴季陶於訪日期間，亦曾會見過日本政友會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他發現「田中頭腦就像一塊化石」。這位繼承日本明治時代推進侵略大陸政策的長州軍閥山縣有朋衣鉢，一心一意對中國進行侵略的軍閥巨擘田中義一，竟於戴季陶訪日歸國後二十天——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繼若槻禮次郎之後出任日本新內閣的首相，提出所謂「對華積極政策」，出兵山東阻撓中國統一，日本的侵略政策遂竟明目張膽的進行。

民國十六年九月，適值 蔣先生第一次下野，他曾以私人身分前往日本訪問，其目的亦在勸告日本朝野正視在革命浪潮中的中國新形勢，放棄對中國的干涉。 蔣先生曾於十一月五日下午專訪田中義一於其私邸，會談兩小時之久。 蔣先生首先向田中表達其三點希望：第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正平等為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有待於日本對華政策的改善；第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的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註五）田中對 蔣先生這三點意見，竟避免作正面的答復，反而問 蔣先生：

「閣下盍不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為？」

蔣先生當即鄭重告以：「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之覆轍，其可再蹈乎？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此固為中國之大患，亦非日本之福利。」當 蔣先生談到「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之時，田中義一突然為之色變。（註六）一位日籍新聞編輯古屋奎二日後曾作評論說：「蓋抱持着分割中國野心的田中，當然會在涉及中國統一的問題上表現出不快。從他的談話和態度，可以充分觀察得出——日本軍閥會在後來為阻止中國統一而瘋狂奔馳的情勢。」

(註七)

蔣先生在其日記中，記錄了不少有關指正日本對華政策錯誤的批評和感想。他斷言田中義一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知其必不許我革命之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碍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止中國之統一。」（註八）他也以此行「不能轉移日本侵華之傳統政策」為憾，但也覺得「於此可以窺見日本政府的真意，亦未始不是一種收穫。」（註九）

二、抗日決心起於濟南慘案

蔣先生訪日歸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後兩個月，在各界一致敦促下返駕南京，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並立即揮師北上，繼續北伐。日本的田中內閣，竟也於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作了出兵山東阻撓北伐的決議，由福田彥助統率的日本第六師團遂於四月末先革命軍而進駐濟南。五月一日，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部隊克復濟南，兩天後即五月三日，即遭到日軍的突然攻擊，造成了中國軍民將近五千人為日軍殺害的濟南慘案。

蔣先生當時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督師前線。慘案發生之日，他已進駐濟南。蔣先生派外交部長黃郛去交涉，橫蠻的日本軍人不講道理，却強逼黃郛在一份屈辱的文件上簽字。黃郛不肯屈服，因而受盡了日本人的辱侮。當他回到總司令部向蔣先生復命時，開頭就說：「日本人沒有當我們中國人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不僅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恐怕自從有史以來，都不曾有過！」（註一〇）

蔣先生所派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和其他十六位外交人員，被日軍殘酷的殺害了。蔣先生的總司令部也被日本飛機轟炸了，幾位衛士無辜的犧牲了性命。福田彥助最後通牒式的要求提出了，狂悖無理，令人難以忍受。蔣先生悲憤極了，忿怒幾不可遏。（註一一）但他經過冷靜的考慮後，仍然決定暫時不能與日本人開戰，於是密令國民革命軍出城渡河，繼續北伐。蔣先生自述其經過說：

「到了五月四日侵晨，日軍曉得張宗昌的軍隊還在德州，他們就打電報去，說濟南已打起來了，要張宗昌的軍隊趕緊回到濟南來，但張宗昌的軍隊已被我們完全打垮，至少要一個星期才能集合得起來，如當時他們果有一兩團兵力能够集合，他一定是會打回來的。這樣日軍當然會掩護他來反擊我們濟南附近的革命軍的。」

「但張宗昌沒有一個軍隊可派，所以日本人只好派飛機來向我總司令部轟炸。那天炸死了我們幾個衛士，並傷了幾個官長，當時我也正在總司令部辦公，但沒有被炸中。那天早上我綜核黃郛部長（郛）熊代表（式輝）二人的報告，我想我們現在還不能與日軍開仗，亦不必與他在濟南衝突，現時惟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負重，仍舊要與他們設法緩和，如果我們能够攻克北京，完成北伐，不患沒有同日軍算賬的機會，於是我抱定了這個宗旨，所以還是派代表與

日軍往來交涉。……

「我就在當夜下定決心，命令我們軍隊要連夜秘密渡過黃河，繼續北伐，不許在南岸停留。而我本人則仍舊駐城內與日軍隨時交涉，使他們不致懷疑本人離開濟南，或我們軍隊要渡過黃河。其時所有軍隊皆遵令前進，連夜渡過黃河了。」（註一二）

蔣先生此一決定，立即使日本軍隊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陰謀爲之破滅。他們到五月五日下午，才發現革命軍的主力部隊已渡過黃河，於是惱羞成怒，立派飛機去轟炸、掃射已經渡過黃河繼續前進的革命軍。這時蔣先生還在城內，一直到六日晨八時才由南門出城，進駐距濟南城垣三十里的黨家莊。蔣先生出城之前，仍然留下了李延年的一個步兵團固守濟南。日軍以一個師團的兵力進攻，經過了三日夜的血戰，李團始遵令撤退，但他一團四營的兵力，至是却只剩了五百餘人。

蔣先生應付五三濟南慘案的謀略完全成功，使日本阻撓北伐的陰謀成爲泡影。但他在這一事件中所親身經歷的事實，使他更清楚的認清了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蔣先生認爲這是空前的恥辱，他立誓要誓雪此恥！在他的日記上，此後每天必記「雪恥」一則以自惕勵。（註一三）一年以後——十八年五月三日，蔣先生在南京對中央軍校師生講述五三慘案經過時，他仍然悲憤填膺，認爲五月三日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紀念日！」他極端沉痛的說：

「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族便沒有一天能够獨立。本校長就是在濟南親身受了這個恥辱的。」（註一四）

曾經隨侍蔣先生親歷濟南慘案的羅家倫，認爲「蔣先生抗日的決心，在濟南事變的時候，就已定下來了。」（註一五）其後歷史事實的發展，已證明羅氏的話正確。自五三濟南慘案以後，即在默默的從事於禦侮雪恥的準備工作。他在十七年五月九、十兩天的日記上這樣寫着：

「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

「有雪恥之志，而不能暫時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余今且暫忍爲人所不能忍者耳！」（五月九日）

「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雪淨後爲止。」（五月十日）（註一六）

三、雪恥禦侮的先決條件：自立自強

北伐告成，中國國民黨於十七年八月在南京舉行二屆五中全會，決議依照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開始實施訓政，並擴大國民政府爲五院制。同年十月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國民政府委員人選，推蔣先生爲國民政府主席。十月十日

，蔣先生在南京就職，開始以國家元首身分，領導全國向統一建設的道路邁進。

世界各國對於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都表示出好意與尊重，只有日本執迷不悞，仍然杯葛國民政府恢復關稅自主權的交涉，並遲遲不肯給予國民政府以外交承認。（註一七）蔣先生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之日，各國政府及駐華使節都一致來電致賀，獨日本政府態度冷淡，毫無表示，只由其駐南京總領事岡本一策向外交部口頭道賀。這表示日本政府仍不認為國民政府和他有對等的國際關係，對蔣先生來說，這是一種有意的奚落。然而蔣先生並無任何不滿於日本政府的表示，只在他的日記中寫下：「日本狹隘嫉忌如此，余當益自強自奮可也。」（註一八）

蔣先生認為報仇雪恥的基本條件，在於中國能够自立自強。因此，他對於雪恥禦侮問題，不同意徒作刺激感情的口號宣傳，主張化悲憤為力量，從實際工作上來埋頭苦幹。他在十八年元旦國軍編遣委員會成立典禮中致詞時，說：「日本對我實行侵略政策。吾人每談到日本，便不勝憤慨，尤其濟案發生之後，舉國同仇。不知徒然憤慨，是無濟於事的。」（註一九）十八年五月三日對軍校學生發表「誓雪五三國恥」的講詞時，更指出：

「我在漢口時，曾致電中央黨部，說我們以後每逢國恥紀念日，再不要多貼標語，空喊口號，更不要在街上示威遊行，亦不應該停課放假，而要鞭策我們自己，督率全國國民，埋頭準備，堅苦奮進。我們在國恥紀念日，無論學校、工廠，不僅不能放假，而且一定要在這天多增加兩點鐘工作，來紀念我們的國恥，須知我們報仇雪恥的敵愾心，絕不能暴露出來，我們所有吞敵的氣概，非到最後關頭，是不能有一點流露的，因為那將徒然為敵人所忌，要來對我們下毒手。」（註二〇）

四、攘外應先安內

蔣先生領導國家步向真正統一的道路，却是崎嶇不平的。日本軍閥既虎視眈眈，國內的不法軍人與中共匪黨，却又掀起叛亂。終十八、十九兩年，蔣先生幾無日不在為國家的統一，而與叛逆作劇烈的鬥爭。從國內叛逆的煽亂禍國，蔣先生深深體察到惟統一始能禦侮的道理，因而他提出了「攘外應先安內」的主張。蔣先生最早提到這一政策，是在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三十三日所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蔣先生說：

「我全國同胞當此赤軍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滅共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註二一）

基於此一認識，蔣先生於七月一日下令進擊江西廣昌、寧都、東固、瑞金等地之赤匪巢穴，展開第三次圍剿之役。二日蔣先生由南昌出發，巡視前線，並進駐南豐。國軍士氣旺盛，連克黎川、廣昌等要地，於十九日即攻克赤匪據為總巢之寧

都。方擬乘勝追擊，不料石友三部突於二十一日在河北順德叛變，聲言響應廣東方面之軍事行動，（註二二）蔣先生遂不得不星夜由前線趕返南昌，籌謀應付可能的政治危機。而日本當局，復藉口萬寶山事件（註二三），在朝鮮發動大規模的排華慘案，局勢乃更形緊張。所幸石友三之叛變不數日即告收平，廣東之軍事行動亦未能猝然發動，故江西剿匪軍乃能繼續進擊，於九月九日攻克瑞金。然九天以後——九月十八日，日本突向我瀋陽進攻，東北各要地繼之淪陷，全國震動，剿匪軍事亦因之功敗垂成。

五、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冷靜應付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次晨——九月十九日，張學良從北平發出皓電，向南京國民政府及南昌蔣主席提出報告。他轉述臧式毅、榮臻等人電報，坦誠承認持「不抵抗主義」：

「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持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燃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臧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註二四）

此電傳抵南京，已在九月十九日下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於當日下午八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由戴傳賢主持，出席及列席中央執監委員丁惟汾、于右任等十七人（註二五），討論「關於日軍強佔瀋陽事件之應付案」，當經決議四項：

- (一) 由常務委員電請蔣主席回京。
 - (二) 根據正式報告，繼續對日方提出抗議，並電令駐外代表向國際間宣佈。
 - (三) 即日發對各級黨部訓令。
 - (四) 從明日起每日開中央委員談話會一次。（註二六）
- 會議同時以下列三點，通告全黨黨員暨國內外同胞：
- (一) 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剷除而外，必須一心一德，鞏固國家基礎，充實政府實力。
 - (二) 一切人民，必須一心一德，努力於救災及禦侮之工作。
 - (三) 本黨同志，必須拋棄其一切意見，造成強固之大團結，以為全國一致之表率。（註二七）
- 會後，五位常委——吳敬恆、于右任、戴傳賢、丁惟汾、朱培德——立即急電南昌，請蔣先生「即日返京」以共議內外應付之方策。（註二八）次（二十日）晨，即再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致電廣州古應芬轉各同志，呼籲以上述三項決議為基礎，促成黨內之團結。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日，蔣先生正乘永綏艦由京赴贛。（註二九）行抵湖口，即於十九日接獲九一八事變之報告暨五位常

委來電，乃立即擱置前方之軍事計劃，於二十日回到南京。（註三〇）二十一日，蔣先生在中山陵園官邸召集中央黨政軍首長會商大計，決定設立特種外交委員會，爲對日外交的決策機構。對外避免擴大戰爭，經由向國際聯盟的申訴，獲得公平的處斷。二十二日，蔣先生應邀對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發表政策性演說時，他重申其「暫取逆來順受態度」的立場。他說：

「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爲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法之判斷。」（註三一）

蔣先生之所以作如此信賴國際聯盟作公理處斷的決定，他的傳記作者董顯光曾作如下的解釋：

「當此之時，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立即以武力對付日本的挑釁，這自然是極度艱險之路；二是採取延緩的措施，藉外力壓迫日本從東北撤退。此第二途徑曾利用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山東的僵局。由於日本在東北之舉動出於關東軍之自發，顯然未與其東京之日本首相協商者，故我國採取第二途徑，未必完全無望。於是蔣總統決計再度利用國際的干涉。」（註三二）

董氏所言，自有其依據。然揆諸事實，中國在當時實在還沒有足夠的條件和力量，來和日本從事全面的戰爭。因爲當時的中國情形是「一個爲分裂的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分裂的國家」（During and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China was a Divided Country ruled by a divided ruling party, the Kuomintang）。（註三三）兩廣方逞意氣，揚起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之幟；贛、湘、鄂、皖等省正陷於赤禍蔓延之中，民不聊生；西南各省仍在當地軍人的控制下，對中央陽奉陰違；北方則是張學良的防區，張却正以「不抵抗」爲得計。中央方自江西前線抽調第十九路軍移師東下，衛戍京滬，而共匪却乘機進攻，威脅南昌，倘中央將全部討共兵力轉用於對日作戰，則將立陷日、共前後夾擊之困境。況八月以來，洪水成災，氾濫至湘、鄂、皖、豫、蘇、贛、閩、粵、川、冀、魯、遼、吉、黑、熱等十六省區，受災民衆達五千萬以上，中央方賑濟之不暇，如何能輕啓戰端，置國民生計於不顧！這種情形，蔣先生於三年之後對廬山軍官訓練團作精神講話時，還曾提出來作爲鑑戒。他說：

「我們抵抗敵人的條件有沒有完備呢？我們自己可以很簡單很沉痛的答覆一句話：一點也沒有。不僅是在物質上和實力上沒有具備，就在我們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沒有統一。」（註三四）

軍事抵抗的條件既沒有具備，自然要運用國際外交以壓制日本。事實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外交部即電令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申訴，要求主持公道。三天以後——九月二十一日，施肇基復奉令要求國聯按盟約第十一條處理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問題。（註三五）國民政府爲加強外交陣容，於十月三日核准外交部長王正廷的辭職，特任施肇基爲外

交部長。復以施肇基不暇回國視事，乃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特任顧維鈞署理外交部長。並先後任命顏惠慶爲駐美公使，劉文島爲駐德公使。（註三六）署理外交部長顧維鈞宣誓就職之日——十一月三十日，蔣先生以國民政府主席身分頒發手令，特別指出「外交乃無形之戰爭」，認爲「外交之折衝樽俎，其致力之遠，收效之大，有遠勝於軍事什百千倍者。」希望顧維鈞布展其抱負，發揮其長才，「力肩艱鉅，不辱使命。」（註三七）

由於外交重要，國民政府特設特種外交委員會以爲決策機構。委員會以戴季陶爲委員長，宋子文副之，顧維鈞爲秘書長，委員爲顏惠慶、熊式輝、吳鐵城、朱培德、劉哲、羅文幹、孔祥熙、賀耀組、于右任、吳敬恆、邵元冲、李煜瀛、丁惟汾、程天放、陳布雷、陳立夫、邵力子、朱兆莘等二十餘人，非外交名宿，即政府要員。委員會每日午前七時即開會，職取報告，決定肆應方策。蔣先生亦係委員之一，有時亦出席會議提出報告。（註三八）十一月間，戴季陶依據特種外交委員會的討論結果，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之報告一件，對日本的軍事政策，國聯制裁的效力，美國的態度等，均作極有見地的分析。（註三九）於對日外交問題，雖判斷「國聯不能採任何有力制裁」，但仍確信「此次對日交涉，中國在國際上，必得最後之勝利。」因此建議政府：

「此時一切政策，以團結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爲根本要圖。對外策略，第一、中國無論如何，決不先對日本宣戰；第二、須盡力維持各國對我好感；第三、須盡力顧慮實際利害，但至萬不得已時，雖在軍事上爲民意而犧牲，亦所不卹，惟必須籌劃取得真實之犧牲代價。」（註四〇）

此一建議當爲中央政治會議所接受，國民政府此時對外交涉，亦以此一建議爲方針。惟由於日本當局悍然拒絕國聯聯盟九月三十日，十月二十四日兩次限期撤兵的決議，及我國內政局發生變化，蔣主席辭職下野，影響到我國在國聯的立場，致使國聯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處理未生效果。因是國人有以「政府一味信賴國聯」爲非計，而主張直接與日本談判者。（註四一）實則在強弱懸殊，仁暴異勢的情形下，中國政府之寄望國聯，希望從國際外交方面孤立日本，自是正當之舉。國聯雖無力立即援助中國收復東北，但却毫無疑問的給予中國以道義的同情與支持。如十月二十四日國聯表決限令日本撤兵一案時，日本的提案只日本一國贊成，終以十三票對一票予以否決，這自然給予中國精神上極大的鼓勵。其後國聯對東北問題的派團調查，亦使日本無所逃避其侵華的罪責。由於中國外交方面運用的成功，日本遂不得不退出國聯，從此陷於外交上的孤立困境。國民政府此時在外交上的努力，關係中國後來對日抗戰爭取勝利的成效至大。（註四二）

六、曲委求全，促成團結

論國民政府應付九一八事變所取外交方針者，多誤會爲國民政府「迷信外交」，甚至懷疑國民政府係有意採取避重就輕政

策，不對日本實行抵抗。實則不然，蔣先生一開始即視外交爲一種手段，作爲外交之後盾且賴以求得生存者，尙是抵抗侵略的意志與決心。他於九月二十二日對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發表講演時，一方面呼籲大家要「逆來順受」，一方面却也公開宣示其準備作最後抵抗的決心。他說：

「此刻暫且含忍，決非屈服。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國民，寧爲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中正許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際，自當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必立在國民之最前線，爲國民之前鋒，共赴國難，以盡我之天職。」（註四三）

這時，國際聯盟派來中國的教育考察團法國郎之萬（Paul Langevin）英國唐尼（Richard Henry Tawney）等一行四人，適在南京。他們曾往訪蔣先生詢問對於日本佔領瀋陽一事的看法。這次談話的經過，蔣先生有一段極爲詳盡的報告：「當兄弟（蔣先生自稱）回到南京以後，國際聯盟會的幾位外國人，適在首都，就來問我說：『日本佔領瀋陽，你看情形怎麼樣？』我就反問他：『你看日本佔領瀋陽的結果，是怎麼樣？』他答：『這沒有多大問題，日本佔領瀋陽，在一星期間，一定不敢不退出來。』我就答覆他：『我的看法與你不同；如果中國自己沒有充分自衛的力量，國際又沒有很大的決心制止暴力，日本不光是在一星期內不撤兵，恐怕一個月甚至一年，還不能撤兵的。』他說：『我不相信你的話，我深信國際的力量，一定可以使日本撤兵。』我說：『於一個星期內，日本決不會撤兵的。』他說：『你的決心是如何？』我說：

『日本侵略我東三省，不是從九月十八日起的，我們早已知道這回事；奈因國內叛變疊出，沒有工夫去顧到，以致今日才有這一回的事發生。日本侵略東三省，不是把瀋陽佔領了幾天，就隨隨便便退出去，他的傳統政策，是以佔領瀋陽爲擾亂中國的根據地；所以我們政府對此問題，祇有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與其生而辱，不如死而榮的決心來對付。我相信中國有怎麼大的民族，有怎麼久的歷史，不是給日本能亡了的。但是我們要表示國家的能力，要表示民族的能力，中國在戰爭上應具的條件，雖不充分，海軍、陸軍、空軍，雖都不如人家，殊無與日本作戰之可能；但是我們表示國家與民族的人格，一定要有此決心。現在中國已經失了的土地，不光是東北三千萬同胞同心協力，非把他收回來不可；就是全國四萬萬同胞，也都有決心，非把他收回不休的。我們一方面很誠意的信仰國際聯盟會，希望國際聯盟會維護正義，主張公道；但是一方面我們國內須有切實的準備，我們料到日本不肯輕於退出東三省，也料得日本不能把大連、旅順輕於交還中國，所以我們唯有依賴國民的能力，與世界上的公道；但我們一定更要有最後的決心。什麼是最後的決心？就是流血的決心。』當時我與他說：『你是一位國際聯盟會的會員，當老實不客氣的對你說：我們對於這一回的問題，自己非切實準備，不能

解決。我們知道，與日本作戰，固不能知其勝負；如果中國不幸被日戰敗，也就是爲自己民族光榮而戰敗，也就是爲保障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而戰敗。如果中國幸而戰勝日本，中國當能在國際上做一好友，且我相信我們祇要盡國家的力量，與民族的力量，決不會喪失自己絲毫的土地的。」（註四五）

國聯教育考察團代表聞悉 蔣先生的決心後，很表欽佩，並向 蔣先生建議：「希望你不要說中國政府將與日本作戰的話。如對日宣戰的話，從中國政府方面說出去，深恐世界各國之擁護正義與和平者，將與中國不表同情。」（註四六）

蔣先生固有此犧牲禦侮的決心，但他深知對日問題，無論用軍事方法解決，或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爲功。（註四七）因之，他於驚聞九一八事變之際，即決心忍辱負重，促成黨內與國內的統一。由贛返京途次，即令討粵部隊停止前進。到京之後，即遣張繼、蔡元培、陳銘樞携親筆函赴粵，磋商共赴國難之策。（註四八）張等離京時，蔣先生曾囑以三原則提示粵方：（一）如粵方自度能負擔國難責任，則全體來京改組國府，南京同人無不相讓；（二）如粵方自度不能担此重責，則粵府應即撤銷，粵中同志應即來京共赴國難；（三）如粵方意在合作，則南京尤爲歡迎，即請同志聯袂來京，面商參加政府辦法。（註四九）經張繼等至香港與粵方汪兆銘孫科李文範等磋商，決定在上海召集一次統一會議。及粵方代表到滬，蔣先生親於十月二十二日飛滬晤商。二十七日，統一會議開幕。計共舉行會議七次，至十一月七日閉幕。除決議改訂國民政府組織及有關中央政制外，並決定寧、粵雙方各自先行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由雙方選出之中央執行委員共同出席一中全會，以建立統一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應付國難。上海統一會議期間，由於粵方過分逞意氣，「主張對人重於對事」，（註五〇）粵方「外交部長」陳友仁且與日本當局勾結，聲言「日本除 蔣擊張（學良）之主張與粵府毫無二致」，（註五一）致 蔣先生承受極大之委曲與痛苦，但他爲謀達成國家的統一，一一忍受。

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開幕。蔣先生致開會詞，鄭重提示與會代表：「黨內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他並引用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古訓，要求大會「能在不背本黨的紀律與大會的尊嚴之下，促成本黨的精誠團結，來一致抵禦外侮。」（註五二）大會旋於十一月十四日議決「代表全黨及全國人民之堅決意志」，發表對外宣言，聲明：

「日本武力佔領東三省，至今已將兩月，中國忍耐至今，已至最後之限度。如日本繼續蔑視國聯保持正義之主張，不顧國際公約之尊嚴，而國聯及各友邦無法履行其簽約國神聖義務之時，中國民族，爲保障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尊嚴，及執行民族生存自衛權，雖出於任何重大之犧牲，亦所不恤；爲生存自衛而抵抗，爲獨立國家應有之權利，亦國際公約所允許。本大會自當領導我全中國民族，奮鬥到底，誓不稍屈於橫暴武力之下，以保持國際之正義，與完成我簽約國對於國際公約之神聖責任。」（註五三）

蔣先生於十一月十九日再向大會作懇切之報告。爲了達成內部的團結，他聲明「在積極方面就是自己親到北方，站在國民前面去救國」，「消極方面，就是希望我們大家容納廣東一班同志的主張，聯合起來，團結起來。」（註五四）次日，大會遂通過聞鈞天等七十八人聯名提出的臨時緊急動議，決議：（一）請 蔣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衛國土，收回失地；（二）請大會代表同具決心，共濟國難。（註五五）消息傳出，中外觀感爲之一新，國人之精神更爲之一振。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閉幕，國人亦咸盼廣東方面立採有效步驟，以完成統一。不意廣東當局意見紛紜，孫科自上海携來之合作方案，竟爲廣州非常會議所拒。汪兆銘與胡漢民之間亦發生爭議。廣州四大大會雖勉強於十一月十八日召開，但遷延時日至月餘，竟毫無成議。蔣先生爲敦促廣東同志早日入京，俾便北上禦敵，曾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致電汪兆銘：「中正急圖北上，立待大會開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廣東諸同志究竟何日可以到京，務望從速電示，俾中央全會，得以定期舉行。」（註五六）然而，廣東方面的答覆却不是「廣東同志何日北上」，而是由胡漢民等聯名發出的「一則通電，要求 蔣先生即行下野，解除兵柄，否則粵方諸人拒絕北行。一度出現的團結禦侮的希望，至是因廣東方面的未能重視實際國家民族利益，而趨於暗淡。」

然而 蔣先生爲促成團結，決定委曲求全。他於十二月十五日正式通電辭職，旋即回居奉化故里。中央常會遂舉行臨時會議，推林森、陳銘樞分別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翌日，粵方代表到寧，一中全會亦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京舉行，選任林森爲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爲行政院長。此次政治變動發生於錦州前線緊急之時，中央忽呈無中心領導狀態，日本關東軍遂乘機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要出兵錦州，並於二十八日向錦州發動總攻。而中國在國聯中所提之錦州中立區方案，亦因蔣先生之下野，中央缺乏公戴之領袖，而不得不宣告放棄。至是 蔣先生不惜任何委曲以謀求團結禦侮的努力，實際上歸於失敗，而廣東諸人之徒逞意氣，亦徒使親痛仇快，史家著述於論及此事，亦無不扼腕嗟嘆！

七、主張抵抗，但反對絕交宣戰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立即觸發了全國各界的抗日救國怒潮。尤其是青年學生，激於一時愛國的熱忱，相率呼籲救亡圖存，並至南京向國民政府要求對日宣戰。共產黨徒從而煽動利用，竟使部分學生藉對日宣戰之請願，發動污蔑國民政府之宣傳與行動。別有用心之政客如陳友仁輩，亦以對日絕交，宣戰之危詞譁衆取寵。於此擾攘叫囂的氣氛之中，蔣先生却堅持其主張抵抗，但卻反對絕交宣戰的立場，雖蒙受誤會甚至攻訐，亦不少曲從。蓋 蔣先生所考慮者爲國家民族長久的利益，他以對國家民族負責的立場，不能以國家民族的命運爲兒戲。他於在南京接見各地請願抗日學生代表時，曾沉痛的說：

「關於抗日情事，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護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我對日宣戰，全國國民一定是稱贊我，把我抬得

很高，但我爲什麼不這樣去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是不怕死，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我現在要爲國家前途打算，要爲民族前途着想，不能爲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註五七）

蔣先生下野之後，於二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故里武嶺學校參加紀念週講述「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時，再度懇切說明不能對日絕交宣戰的理由和決心：

「自東北問題發生以來，一般激於悲憤，不暇慎擇，或不顧事實，徒逞快意之論者，不曰對日宣戰，即曰對日絕交；不知中國若有適當之國防實力，則當朝鮮之慘殺華人，及萬寶山案發生，皆可爲絕交宣戰之理由，不必暴日鐵蹄蹂躪瀋陽之時也。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爲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總理孫先生所謂：「中國若與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此乃事實如此，並非我總理故爲危辭聳聽也。故忠於謀國者，必就實際之力量，而謀適應之措置，不能效不負責任之輩，不審察實際之利害，逞爲快意之談，徒博一時之同情，而置國家於孤注之一擲也。

且以日本帝國主義之暴悍無人理，猶不敢顯然對中國絕交宣戰，而猶是出於戰而不宣之行爲者，蓋欲避免宣戰之責任，以減輕國際之責難也。今我明明尙無可戰之實力，而貿然爲暴日所不敢爲之絕交宣戰，則適予暴日加責任於我之機會，而益得以恣行無忌矣。……

是以余於昔日當政之時，即告國人，余寧含垢忍痛，決不願意以個人一時之快意，博得國民之同情，而簽對日首先絕交與宣戰之字。誠以國家爲重，個人爲輕；民族悠久之生命爲重，個人一時之榮辱爲輕；故寧可毀滅余個人過去一切之事業與歷史，而保存我國家與民族之利益，決不肯犧牲我四萬萬同胞之利益，以換得余個人一時之虛名，而永爲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世之罪人也。」（註五八）

中國戰力之不足以抵擋日軍之進攻，凡有歷史常識者皆不之疑。如日軍進攻錦州時，中央固曾頒發就地抵抗之令，然據中央常務委員朱培德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之報告，「據軍事專家推測，前方一經接觸，至多恐不過維持一星期左右」，（註五九）軍力如此，錦州終不能守。

一二八上海事變爆發，蔣先生尙以個人身分號令駐軍抵抗，他並於一月三十日，通告全國將士「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決心」，以與「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註六〇）但仍反對宣戰。據羅家倫「忍天下之不能忍決常人之所不

敢決」一文所記：

「記得一二八淞滬戰爭發動的時候，名義上他已經不負軍事、政治的重責。當時陳友仁身任外交部長，主張宣戰。這匹冒險家的野馬，幾乎不能控制。蔣先生一面密令中央軍的精銳第五軍，稅警團，和第九師星夜赴援，不顧犧牲，加強抵抗；一面教一位朋友，坐小飛機飛到南京，帶了兩封親筆信來：一封上林主席，一封給在京的朋友們，痛切的說，抵抗是其心願，宣戰萬萬不可，因為宣戰是以國家為孤注一擲，我們斷不能不以國家存亡為重。」（註六一）

據汪兆銘說，蔣先生此一應付日本的方針，曾獲上海統一會議的同意。不料陳友仁突然異想天開，以外交部長身分主張對日絕交。他的主張為張繼、陳銘樞等人反對，乃行辭職。但他於辭職赴滬後，竟在英文大陸報發出宣言，說他主張的對日絕交，因被蔣先生反對而不能實現，所以辭職。汪兆銘覺得陳友仁的宣言與事實不符，乃於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向中央政治會議提出口頭報告：

「我們對於他（陳友仁）辭職宣言裏所說的，覺得有不合於事實的，所以不能不把經過情形報告一下……去年十月間，南京派了幾位同志，和廣州所派的幾位同志在上海開會時，曾經定了幾個原則，第一是從那時起，馬上就把外交統一起來，對外交涉，全由南京來辦，就是說，廣州不辦外交。第二是說如果日軍來進攻，我們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他，不要不抵抗。第三是我們不主張對日宣戰，因為日本沒有對我們宣戰，我們抵抗與不主張宣戰是沒有抵觸的。第四是我們不主張退出國際聯盟，當時還有許多民衆團體要求對俄復交，我們以為這是另一問題，不要和對日外交方針混在一起，當時大家對於這些原則都很同意，那時廣州政府還沒有取消，所以就這原則分電南京廣州，雙方也都贊成，所以這幾條原則，是共同的對日方針。……」

一月二十一日晚上，兄弟到了南京，二十二日，在勵志社舉行中央委員談話會，最先陳友仁部長提出對日絕交問題，行政院院長陳銘樞同志，就反駁他。陳同志說：『前幾天我所以不反對絕交，是因為目前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是我們決不妥協，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二是我們屈服。如果我們對日不妥協，準備和他宣戰的，那麼絕交是第一步表示我們的決心，所以我並不反對。現在我們為達到和平的目的而絕交，我是不能贊成的。』張溥泉同志也發表這種意見。陳友仁部長又說：『我們對日宣佈絕交之後，我們把所有的軍隊都開到江西去打共產黨，表示我們並不對日本作戰，以求達到和平解決。』張溥泉同志就說：『你這兩個主張不是相反的嗎？要絕交便即應備戰，不備戰就不應絕交，絕交後把部隊開走了，日本不好藉口絕交就向中國進兵的嗎？』當時大家對於陳部長的主張都發生懷疑，兄弟還說了幾句和在杭州說的相同的話，並且表示現在要變更從前在上海所定的原則，兄弟不願有所主張。到了第二三天，孫哲生同志走了，陳部長也走了。那天談話會中，兄弟僅僅說：『我們現在對於日本，不是絕交所能應付得了的，日本沒有經過宣戰，就佔領了我們的地方，我們光

是對絕交怎能濟於事？我們要進一步的想法子對付他。」以上所說，就足以證明陳友仁部長的宣言措辭是不對的，因為不贊成對日絕交是在杭州時大家所說的，及在勵志社時大家所主張的。陳友仁部長爲什麼攻訐 蔣介石同志一個人？這是不對的。」（註六二）

八、抵抗聲中的國力考驗

孫科於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任行政院長，而錦州於二十一年一月四日淪陷，東北全境除馬占山等部義勇軍猶在抗敵外，國軍已無立足之地。軍事而外，財政外交，同感棘手。故孫氏就職未及二十日，乃親謁 蔣先生於杭州，邀 蔣先生回京主持大計，時汪兆銘亦於一月十六日至杭訪 蔣先生敦促， 蔣先生乃與汪兆銘於一月二十一日同返南京。一月二十八日，汪兆銘繼孫科出任行政院長， 蔣先生則僅以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身分，協助主持。至三月六日，中央政治會議始決議推選 蔣先生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三月十八日 蔣先生始行通電就職，並兼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

日軍進攻淞滬，遭遇到我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之英勇抵抗，雖三次增援，四度易帥，猶未能突破我軍陣地。我兩軍將士，忠勇奮發，苦戰之三十二日之久，至三月二日始作戰略上的後撤。而外交部之發表自衛宣言，申明抵抗侵略之嚴正立場，國民政府之遷移洛陽辦公，以示長期抵抗決心，亦均足以使日本當局感到驚懼。此次戰役之效果，誠如中央電令所稱「兩軍將士所流之血，凝結爲一，使強鄰挑撥離間之技無所施，僉人操縱捭闔之謀無所用。」（註六三）而對國內民心士氣之振奮與國外觀感印象之轉變，均足增強我國之地位與聲望。（註六四）然此次淞滬抗戰，亦爲對我團結程度與統合戰力之實際考驗。不幸得很，我們却於此次考驗中，發現還有若干難以克服的弱點與困難。

首先，是增援與運輸的困難。日本可以藉不平等條約爲護符，兵艦馳突於長江上下，更以公共租界爲陸軍之登陸地點與作戰根據地，於是援軍可以源源而來，毫無阻礙。我國却因交通不備，運輸不便，及日本軍艦之阻截，除第五軍駐在蘇浙尚可及時赴援外，其餘各處部隊尚在長途跋涉中而戰局已告結束。下面所述乃是一例：

「（淞滬戰爭時）長江以南既沒有可以調用的兵力，不得已，曾調派駐守河南的胡宗南師南來。長江中佈滿了日艦，胡宗南師到達了江北，祇好改裝平民，化整爲零，晝伏夜行，坐木船偷渡長江，費了二十多天時間才到南京集中，淞滬前線已經撤守了。」（註六五）

其次，北方軍隊龐雜，且面對強敵，無法抽調；而四川等省軍人私心太重，亦不聽中央調遣。淞滬戰爭爆發後， 蔣先生於二月一日到徐州召開軍事會議，然後前往洛陽，政府乃議定「全國防衛計劃」，劃全國爲四個防衛區及一個預備區。其區分如下：

第一防衛區：黃河以北，司令官張學良，徐永昌副之；統率東北軍及晉綏軍全部。

第二防衛區：黃河長江間，司令官蔣中正，韓復榘副之；指揮駐在魯、豫及蘇、皖北部之軍隊。

第三防衛區：蘇南及浙、閩，司令官何應欽，陳銘樞副之；除指揮第十九路軍及八十七、八十八師外，並抽贛抽調五師增援淞滬，而由湘出二師，粵出一師入贛，監視贛南共匪。

第四防衛區：廣東廣西，司令官陳濟棠，白崇禧副之；統轄駐粵桂之軍隊，並派一師入贛剿匪。

預備區：四川，司令官劉湘，劉文輝副之，應準備五師以上兵力，集中鄂東待命。（註六六）

中央作此佈署後，曾派張篤倫入川見劉湘與劉文輝，商移師東下以策應淞滬作戰。不料張抵漢口時，劉湘即致電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請其阻止張氏入川，並稱去則必然槍斃。張篤倫遂不果行，中途折返。（註六七）

廣東的情形同樣糟糕。在粵諸人雖高呼抗日，當中央請其派兵一師入贛監視共匪，俾可抽調贛北剿共國軍赴援淞滬，廣東當局却拒不遵命。共匪既無後顧之憂，遂集全力拖着國軍，駐贛國軍遂無法東援。例如駐贛之第九師蔣鼎文部，奉命赴援淞滬，並限於二月二十日到達。然由於交通梗塞，加以共匪跟踪追擊，由贛沿閩邊入浙，且戰且走，後面一旅陷入重圍，回師抄擊，始免於難，及至開至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而淞滬已撤守矣。

再次，亦是最嚴重的問題，乃為江西共匪之趁勢出擊，與淞滬日軍東西呼應，妄圖顛覆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起來，蔣先生回返南京應付危局，前線剿共軍隊亦已奉令停進，而中共則於九月二十日密令其紅軍乘機反擊。九月三十日，並宣稱「國民黨是中共永久的敵人」。（註六八）其後即乘國軍東調增援抗日軍事之際，分向贛南及浙、閩出擊。且於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建立其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擴大叛亂，十二月十日，錦州已告急，而彭德懷部共軍則進攻贛州；及二十一年一月淞滬戰爭爆發，共黨中央又發表其「中國共產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誣蔑浴血奮戰的國軍將領為「國民黨軍閥」，號召正和日寇拼戰的國軍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武裝擁護蘇聯」！（註六九）並乘機四出竄擾，其範圍已遍及於湘、贛、浙、閩、鄂、豫、皖七省，總計面積在廿萬方里以上，於是「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註七〇）

以上所舉事實，已足以證明：在當時的情勢下，中國實不能對日本從事全面的戰爭，也證明蔣先生「攘外必先安內，團結始能禦侮」政策的正確。經過此一教訓，政府與人民均能體認現實環境之艱難，對日本準備作長期抵抗的打算，（註七一）對共匪則一致支持蔣先生的政策，繼續進行圍剿！

九、忍辱負重，準備決戰

上海停戰協定於二十一年五月五日簽字。四天之後即五月九日，蔣先生出席南京軍界聯合總理紀念週，以沉痛的心情

講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一頁國恥痛史，說：「在一部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史中，以日本給我們的國恥爲最大。」他要求聽講的武裝同志「要覺悟，要反省」，「要同越王勾踐一樣去臥薪嘗膽，求雪國恥」，「必須每天二十四點鐘時時刻刻都要拿這國恥二字記在腦中。」（註七）當然，雪恥禦侮不只是沉痛的口號，而是要做踏實的工夫。就在這同一次講演中，蔣先生提示出兩個方向：一是要復興我們自己的民族精神，團結奮發，一致奮鬥；一是瞭解敵人——明白敵人立國精神及其特長，然後予以打擊。從此時起，蔣先生即領導全國軍民從事於生聚教訓的工作，以充實國力，復興民族，待最後關頭到來即與日本決戰。

由於在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期間共匪的擴大叛亂，蔣先生乃決定首先從事於剿匪工作。他於六月九日在廬山召集豫、鄂、皖、贛、湘五省剿匪會議，重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決定對共匪發動第四次圍剿，而以消滅鄂、豫、皖三省邊區的共匪爲第一目標。蔣先生認爲中國要抵抗日本，必須能自立自強；自立自強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自強的地方，即自強的空間；一是要有自強的機會，即自強的時間。（註七三）剿匪即所以創造自強的空間，因爲政府把匪區收復過來，才有足夠的空間，供未來對日戰爭中迴旋。所以他於收復豫、鄂、皖之後，於二十一年十二月回到南京，對中央軍校師生講話時，即說：

「我們現在有沒有自強的空間呢？在上半年出發到武漢去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自強的空間，現在已經有了……我想我們將來和日本戰爭，一定是在長江以北，如果長江以北不能夠安定，日本便可致我們死命，所以我這一次到湖北，先收拾鄂豫皖三省，就是這個道理。」（註七四）

剿匪的工作積極進行，日本的侵略有增無已，而我民族復興與國家建設也在艱苦的奮鬥中天天進步。蔣先生認爲九一八以後的局面，已是日本獨霸東亞之勢，他在民國二十三年，即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於三年之內爆發。因此國人必須要爭取這三年的時間，以求在危難重重中，開出一條生路。他的話是這樣說的：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佔領了我們東三省以後，我們國家的情形，和整個世界大勢都起了一個最大的變化；尤其是我們國家的地位而言，前後完全是判然兩期。在九一八以前，我們中國在列強均勢之下，彼此利害衝突之中，還能保全領土，並且我們革命黨還可以利用這個國際環境來從事革命工作，以求國家和民族的一條生路，因此我們政治上一切進行，都比較容易。自從九一八日本佔領我們的東三省以後，我們中國過去所賴以苟全的列強均勢已經打破，日本已開始獨霸東亞，凡關於東亞的事情，除日本以外，無論何人都不容過問。在這個時候，如果各國有力量量的話，也就可以和日本對抗，不許他獨霸一方，但是各國在東亞都不能也不願發揮他們的力量，只好坐看日本人在東亞橫行霸道，一切條約都被撕毀而莫可如何，所以自九一八以後，日本的獨霸主義已抬頭猛進，中國的情形，事實上就是列強均勢之下的苟存局面，而轉到日本獨霸勢力壓迫的局面。我們在現在這種情勢之下而要保全我們國家，爲民族求一條生路，比較在九一八以前，其難易之差，何啻萬倍！總之，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國家真已陷於岌岌危亡，朝不保夕的險境！」

今年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西曆一九三四年，這民國二十三年，西曆一九三四年，是什麼時代？就是隔離世人之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勢必爆發的民國二十五年，西曆一九三六年，只有一年的時間，英美日三國海軍條約，在這一年期滿，日本退出國聯後，一切權利義務也在這一年終了，特別是南太平洋委任統治地應當交還國聯，美國的海軍建設，英國的新加坡築港，也在這一年完成，這些問題都足以引起世界大戰。還有更重要的，蘇俄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在一九三七年也要完成，而且依第一次五年計劃進行的速度來計算，或許在一九三六年可以完成，這是蘇俄的敵人所最焦急而不能等待的。因此也有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必於一九三七年以前爆發的嚴重性。

大家曉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為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爭中國，就是要解決中國問題。就中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們亡國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復興的機會！到那時我們如果沒有自保的力量，便純粹要成『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局面，結果，一定亡國！所以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最多就是在這三年之內決定！三年的時間，總共還不到一千一百天，我們整個國家，就靠在這急迫而短促的一千一百天，能從艱難困苦危險當中竭力造成復興基礎！總要使他轉危爲安，轉弱爲強！」（註七五）

蔣先生的話幾乎完全應驗，中日間的全面戰爭果於二十六年爆發。蔣先生當時的安內政策，爲國家爭取了自立自強的空間與時間，也爲國家培植了可戰可勝的條件，但在當時却受到一部分國人的誤會與敵人叛徒的誹謗。但蔣先生不加解釋，不作爭辯，將一切屈辱都承受下來。他說：「自九一八以來，爲了國家所受的一切誹謗，一切恥辱，可以完全由我一個人担承，爲的是要犧牲自己，選擇一條救國最有效的途徑，竭盡我對國家最大的責任。」（註七六）

十、結語

九一八事變前後，蔣先生應付日本侵略的過程，是一段茹苦含痛忍辱負重的艱苦奮鬥過程。他的深遠的用心和打算，直至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才爲國人所明悉。由於蔣先生的明智，爲中國爭取了六年的時間，就在這六年內，中國的統一有了基礎，國家的建設有了成就，國民的思想有了進步，國家的軍備有了發展，到二十五年的秋季，中國已完全更換了新的面貌，世界列強包括日本人在內，不能不刮目相看。有這六年的奮鬥，中國才真正走上自立自強的復興之路；有這六年的建設，才能奠定我們八年對日抗戰最後勝利的基礎！我們却永遠不能忘懷：這六年的成果是在蔣先生的領導下創造的。

附註：

（一）蔣先生民國開國後第一次渡日係在民國元年一月，同年冬返國；第二次渡日係在民國二年冬，三年春曾回國策動討袁，旋再赴日，至九一八事變前後 蔣總統的對日政策

民國四年冬回國。

(二)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第四冊，頁一四三九。

(三) 同②。

(四) 同②。

(五) 董顯光：「蔣總統傳」，上冊，頁一二七—一二八。

(六) 同⑤。

(七) 古屋奎三編著：「蔣總統秘錄」第七章「北伐之進擊」。

(八) 同⑦。

(九) 董顯光前書，頁一一八。

(一〇) 蔣中正：「誓雪五三國恥」，民國十八年五月三日在中央軍校講。

(一一) 羅家倫氏於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決常人之所不敢決」一文中，回憶蔣先生當時的悲憤情形說：「總部被炸以後，我到他（蔣總司令）房裏，看見他的怒氣，幾不可遏；他要我準備兩個國際文件，並且告訴我準備退出濟南的意思。我當時也忍不住氣，有背城借一的心理，於是憤憤的請問道：『我們就此退出嗎？』他半晌不回答，祇是靠在沙發上從口裏噓出無限為國家民族所受的鬱積之氣；最後向我說道：『等我擺開部隊以後，再向他說話。』」

(一二) 同⑩。

(一三) 秦孝儀編：「蔣總統大事長編」卷一，頁一八二。

(一四) 同⑩。

(一五) 羅家倫：「忍天下之所不能忍決常人之所不敢決」，見「六十年來之中國與蔣主席」(南京拔提書局印行，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一六) 同⑦。

(一七) 日本遲至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正式承認國民政府，至一九三〇年五月始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一八) 「蔣總統秘錄」第八章「全國統一」。

(一九) 「革文獻」第二十四輯，頁四。

(二〇) 「革命文獻」第十九輯，頁一三八五。

(二一) 「蔣總統大事長編」，卷二，頁二九—三〇。

(二二) 據蔣總統於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之「告全國同胞書」，指出石友三之叛變，實受粵方五十萬元之收買。見「蔣總統大事長編」卷二，頁二八。

- (二三) 萬寶山慘案發生於民國二十年七月三日。有關此案及朝鮮排華文獻見「革命文獻」第三十三輯。
- (二四) 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二)：「九一八事變」(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印行，民國五十四年七月)，頁二一。
- (二五) 此會亦即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六〇次常務會議。出席者為戴傳賢、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列席者為方覺慧、恩克巴圖、陳肇英、張道藩、吳敬恆、克興額、邵元冲、曾養甫、陳布雷、王正廷、邵力子、陳立夫、焦易堂。
- (二六)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六〇次會議記錄原稿。
- (二七) 「革命文獻」第三十五輯，頁一九四—五。
- (二八) 同上，頁一九一。
- (二九) 「革命文獻」第三十六輯「日本侵華大事年表」(一)。
- (三〇) 蔣中正：對「對日問題專門委員會報告」補充說明，見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速記錄原稿。
- (三一) 蔣中正：「一致奮起共救危亡」，見中央週報第一七三期(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
- (三二) 董顯光：「蔣總統傳」(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中冊，頁二一六。
- (三三) T. K. Tong,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apers, Nov. 1963
- (三四) 蔣中正：「抵抗外侮與復興民族」，見「領袖十年來抗戰言論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頁一八七—一八八。
- (三五) 施肇基奉令依據國聯憲章第十一條，向國聯提出聲訴，要求三點：(一)此項危害國際和平之局面，制止其再擴大；(二)回復原狀；(三)確定日本對中國賠償之性質及數額。參閱金問泗：「從巴黎和會到國聯」，頁五九。
- (三六) 顏惠慶係於九月二十五日任命，劉文島係於十月十七日任命。
- (三七)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印，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卷十一，頁四七—八。
- (三八) 如特種外交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七時至十時在中央黨部舉行)開會時，蔣主席即曾出席，並作如下之報告：「日本對於此次國聯決議，堅不接受，已甚明顯。以後情勢實較未決議前更為嚴重。自國聯決議案經行政院會員國，除日本外，全體一致通過。日本態度非退即進，自日本對華傳統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進一步不可，以後情勢如何變化，正難逆料。本莊宣言，所謂頭可斷，兵不可撤，非故作悲壯，其居心確實如此。吾人處此情狀之下，單獨對付既有許多顧慮，而一方在國際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後，自應信任國聯，始終與之合作。而為國聯本身設想，倘此事無法解決，以後世界和平一無保證，國聯即可不必存在。對外宣言中應將此層意思明白表示。」
- (三九) 報告計含七條，全文見「革命文獻」第三十五輯，頁一二七—九；「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一冊，頁三七—三五。
- (四〇) 特種外交委員會報告第五條，見「革命文獻」第三十五輯，頁一二八。
- (四一) 如胡適之，即曾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寫信給宋子文，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

- (四二) 蔣永敬：「九一八事變中國方面的反應」，見「新時代」五卷十二期，民五二、十二、十五。
- (四三) 「中央週報」第一七三期，民二〇、九、二八。
- (四四)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十一，頁三六。
- (四五) 蔣中正：「對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日問題專門委員會報告補充說明」，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速記錄。
- (四六) 同上。
- (四七)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十一，頁四八。
- (四八) 梁敬錫：「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二九。
- (四九) 同上書，頁一三一。
- (五〇) 梁敬錫氏曾作評論曰：「粵方主張對人而不對事，其對人目標，除蔣主席外，尚有張學良。蔣雖願下野，然抗日剿共諸大事，蔣去誰可相當？則汪胡皆不計及；張學良喪師失地，雖有可去之理由，但錦州熱河華北之奉軍尙數十萬，張去誰可指揮？粵方亦不理會。」見梁著「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三一—二。
- (五一) 梁敬錫前書頁二三引日本外務官記錄（中國內亂關係卷）。
- (五二)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十一，頁四五。
- (五三)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外宣言」，見「革命文獻」第三十五輯，頁一二三七—四〇。
- (五四) 蔣中正：「對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詞」，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原稿。
- (五五)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記錄原稿。
- (五六) 天津大公報，民二〇、十二、一。
- (五七) 李守孔：「總統蔣公領導對日抗戰的全盤戰略」，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八卷第十期（民六四、十、台北）。
- (五八) 蔣中正：「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全文見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及「革命文獻」第三十五輯，頁一二九—一九七。
- (五九) 中央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第五十九次會議記錄，民三十、十二、八、南京。
- (六〇) 蔣中正：「告全國將士電」，見「革命文獻」第三十六輯，頁一五五四。
- (六一) 同（一一）。
- (六二) 中央政治會議第二十四次臨時會議速記錄，民二一、一、二八、南京。
- (六三) 中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慰勞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將士電，民二一、三、六。
- (六四) 胡適於所撰「上海戰爭的結束」一文中，認為「這三個月的淞滬事件至少有兩種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因為這事件發現了

我國民的抵抗力，增高我民族的自信心。……第二、因這事件的外交經過，稍稍引起政府負責任的態度。……」

(六五)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一〇四。

(六六) 蔣永敬：「九一八事變中國方面的反應」；吳相湘前書，頁一〇二—一三。

(六七) 蔣永敬前文；吳相湘前書，頁一〇三—一四。

(六八) 梁敬輝：「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二一。

(六九)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二九五。

(七〇)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央文物供應社，六版本），頁六三。

(七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已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日通過「鞏固國防長期抗日案」，在洛陽召集之國難會議（二一、四、七一—一二）發表的宣言中，亦認為「中國在此嚴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國才力，共作長期抵抗，無以圖存。」學者如丁文江，也認為「抗日救國不是幾天的事，並且不是幾年的事，是要有長期的決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原來積極主戰的孫科於滬戰後也向中央提出「確定長期抗日方針案」，主張謀求長期的抗日方略。

(七二) 蔣中正：「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見「領袖十年來抗戰言論集」，頁四一—五三。

(七三) 蔣中正：「怎樣復興中華民族」，見上書，頁八五。

(七四) 同上，頁八六。

(七五)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十二，頁一三四—一五。

(七六) 同上書，頁二五六。